

伦理语用学视阈下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刘风光¹, 石文瑞²

(1.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2.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 政治谴责在维护国际道义、传达政治立场以及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在阐释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内蕴的基础上, 以中美政治媒体话语为语料, 分别从内容与形式维度探讨中美谴责言语行为的异同。研究表明, 在内容维度上, 中国主要谴责“暴力冲突”等主题, 提倡和平发展与法律制度; 而美国多就“全球问题”等进行谴责, 倡导有效执政与道德秩序; 在形式维度上, 中美谴责言语行为均借助谴责重陈语、负评强化语、谴责凸显语等内部策略实施, 但在起始语、辅助行为语等调整谴责语力的外部策略层面多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 本研究在伦理语用学视阈下进一步探讨以上结果所蕴含的文化范式与伦理秩序, 揭示谴责在中美语言文化中异同的动因, 并为政治话语研判及传播提供启示。

关键词: 政治谴责言语行为; 主题分析; 施为策略; 伦理语用学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peech Acts of Condem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Pragmatics

LIU Fengguang¹, SHI Wenrui²

(1.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2. Nor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ondemn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pholding international morality, conveying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Based on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of political condemn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ndemnations in their content and linguistic forms. In terms of content, Chinese condemnations mainly focus on “violent conflicts” and advocate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legal system, while American condemnations mostly relate to “global issues” and promote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moral order. In terms of linguistic forms,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peech acts of condemning are realised by means of internal strategies such as overstatement, intensifiers and amplifiers. Ye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aspects of alerters and supportive moves in external strategies to adjust the force of speech act of condemning.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ultural paradigms and moral orders behind thes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pragmatics. The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for the assess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language use.

Key words: political speech acts of condemnation; thematic analysis; illocutionary strategies; ethical pragmatics

1. 引言

谴责是对具有个人冒犯性或集体破坏性的行为进行公开指责或告发 (Finlay 2014), 反映基于文化信仰的伦理观念及实践 (Buttney 1993)。当前学界多从社会学、政治学及心理学等视角探讨谴责对人类伦理观念的重要影响 (Fitzpatrick & Gellately 1996; Malle *et al.* 2014)。语言学领域谴责研究聚焦于特定情境中具体谴责言语的意图, 以及对谴责的回应策略, 如拒绝 (韩丹 2021)、道歉 (Kampf & Löwenheim 2012) 以及回避 (Hansson 2015) 等, 鲜关注谴责言语本体及其规约性、程式化的语言形式。

政治家在演讲、辩论以及访谈中通过呈现精心设计的文本, 谴责其它政治行为体在伦理 (Dovey 2000)、法律 (Fitzpatrick & Gellately 1996: 761) 或规约价值观 (Dixon & Durrheim 2003) 等方面的错误行为。政治谴责对政治秩序和伦理的维护、传播与重构至关重要, 但目前尚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因此, 本研究分别从谴责言语行为的主题与内外部施为策略等方面对比分析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在内容与语言形式维度的异同, 并在伦理语用学视阈下揭示上述异同的理据, 旨在为政治话语研究提供启示。

2. 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及其伦理阐释

2.1 政治谴责言语行为

Austin 首次将谴责归为表达类言语行为 (1962: 79)。本研究将谴责言语行为界定为: 发话人公开针对其认定的错误行为对受话人进行批判, 意在引发其悔恨感和被倾轧感, 并公开对违反伦理的人进行批判, 以维护社会规范。

政治谴责作为一种公开言语行为 (Noy 2009), 有内在的权利 - 义务关系, 即政治主体在身份与语境双重制约下发出规约化的言语, 其目的并非与被谴责方达成共识, 而是要迎合政治受众期待, 获得更多话语权, 甚至污名化政治对手 (Braithwaite 1989), 并引导社会舆论, 普及政治价值和观念。

因此, 本研究将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界定为政治行为体对其它政治行为体触犯法律、违背伦理或悖逆规约价值观等破坏社会公认法制与普世伦理的行为实施批判、威慑和问责等, 目的是在政治事件中表明立场, 维护现有政治伦理与规范, 或在政治纠纷中掌握话语权, 重构政治伦理与规范。

2.2 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伦理阐释

伦理即关于价值和道德的普遍知识, 兼具描述与评价双重意义, 有倾向性与劝导性功能 (斯蒂文森 1991)。政治伦理主要体现为政府道义, 即“责任伦理”, 如政治主体保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履行国际规范的义务等 (阎学通 2020)。此外, 政治主体受其体制性身份的影响, 需遵循既定权利 - 义务关系 (Márquez-Reiter & Haugh 2019), 建构特定政治秩序。

伦理语用学既关注特定伦理秩序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也关注如何通过语言维护道德秩序 (陈新仁 2017)。在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中, 一方面, 政治主体根植于内在的伦理信念, 受众的理解也依附于特定的规范; 另一方面, 多元社会中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是政治主体通过话语构建的 (哈贝马斯 2018), 因而政治谴责言语行为能够改变或重构伦理规范。本研究从以下三个层面提出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伦理阐释。

语言 - 伦理内涵层面: 政治谴责言语行为有内在伦理性 (Wodak 2006), 不可避免地负载着特定的伦理价值。一方面, 谴责者需对谴责进行正当性说明, 因而内容中包含是非善恶等伦理问题的语言意义; 另一方面, 谴责的言外之意也体现了政治主体所秉承的伦理价值。

语言-伦理条件层面:政治主体有责任对错误行为提出谴责(Kampf 2021):其一,政治主体受其体制性身份的制约,承担着对政治危机事件进行表态的责任;其二,伦理秩序限制了政治主体的语言选择与情态表达,在实施言外之力的同时保证政治语言的适切性。

语言-伦理评价层面,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具有情感性与倾向性,蕴含着明确的态度和信念。政治主体通过谴责言语行为对政治事件进行描述与评价,同时通过表态、承诺、建议等劝服受众承认其伦理观的合理性和约束力,从而掌握政治话语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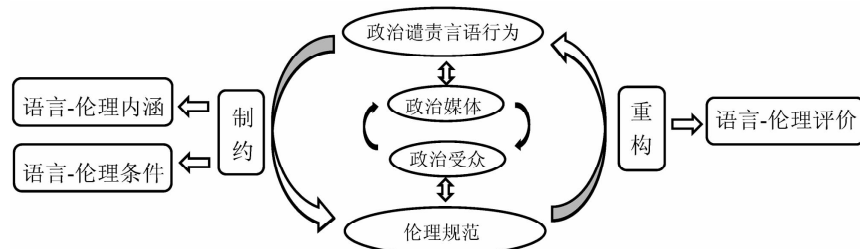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伦理阐释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 (1) 伦理语用学视阈下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在主题内容上有何异同?
- (2) 伦理语用学视阈下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在语言形式上有何异同?
- (3)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在以上两方面的对比揭示了怎样的伦理价值?

3.2 数据来源及分析步骤

本研究在2016.01—2021.04期间中美外交部及主要政治媒体官方网站中,以“谴责”与“blame/condemn”^①为检索词进行搜索,利用Python系统爬取数据。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对检索到的数据进行勘误、去重、筛选、文本信息去噪等预处理,最终建成中美政治谴责对比语料库,并进行了切词、标注等初步数据处理。表1为统计结果。

表1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可比语料库统计结果

中国			美国		
来源	样本数	字符数	来源	样本数	字符数
中国外交部	123	463289	美国外交部	732	5640436
人民网	623	390407	美国广播公司	1872	13243906
中国网	6243	7003639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307	1085573
中国日报	4732	7673657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6184	53952450
中国新闻网	9150	8757771	洛杉矶时报	1309	8946763
合计	20871	24288763	合计	10404	82869128

^① 基于“谴责”与“blame/condemn”的基本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责备、严正申斥;《牛津词典》:to think or say that somebody/something is 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bad / to express very strong disapproval of sb./sth., usually for moral reasons)、前人文献(Malle et al. 2014)及先行数据观察,本研究以“谴责”与“blame/condemn”为关键词进行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针对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内容和形式分析,本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对于前者,我们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中美政治谴责的关键词进行挖掘与聚类;对于后者,由于语料库数据庞大、自动标注信息有限,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从可比语料库中各抽取 100 篇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谴责言语行为的内、外部策略进行标注和分类,并对各策略的使用频率差异进行卡方检验。此外,因政治言语行为对语境依赖度较高,为确保数据准确,对三名编码者的最终结果进行 Krippendorff's Alpha 信度检验,结果理想。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语言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叶蜚声、徐通锵 2010: 22),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内容承载着特定的意义,影响着政治活动(彭文钊 2017);而形式具有规约性,制约着意义的构建与传达。二者共同传达语言-政治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以言取效,建构话语秩序。

4.1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主题内容对比

主题是内容研究的普遍关注点(Ayres *et al.* 2003),政治语篇言语行为的复杂内容意义通过特定主题实现(Krauss 2005)。

为提取中美政治谴责热点,本研究基于 TF-IDF 统计法,通过词频和逆文件概率两项指标来确定。主题词权重越大,其主题性越强,反之亦然。得到的主题词,我们回归语境进行验证,人工剔除不具有明确语义的数词、虚词、人名等,结果如表 2。

表 2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主题词(前 50)

中国				美国			
合作	暴力	袭击	安全	coronavirus	government	pandemic	right
和平	极端	制裁	经济	campaign	peace	justice	executive
疫情	伦理	法律	秩序	republican	lawmakers	religious	muslim
内政	犯罪	威胁	政策	war	racist	military	democratic
责任	战争	暴徒	示威	party	attack	trade	nuclear
发展	国际法	权利	人权	crisis	supremacist	protest	humanitarian
攻击	一国两制	病毒	道德	moral	gun	prison	administration
宗教	慰安妇	移民	贸易	health	supreme	security	victim
爆炸	对话	恐怖主义	违法	assault	election	conflict	violence
纳粹	歧视	抹黑	武装	violation	justice	weapon	emergency
冲突	主权	共同体	炸弹	terrorism	candidates	drug	market
携手	法规	污蔑	种族主义	extremist	financial	legislation	immigrate
侵犯	人道主义			territory	responsibility		

为进一步对比中美政治谴责主题的差异,本研究对上述主题词进行聚类,归纳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主题维度,并对提取的主题维度进行对比分析。中美主题维度按权重分布状况如下页图 1、图 2 所示,主题节点越靠前、形状越大,代表主题权重值越大、关注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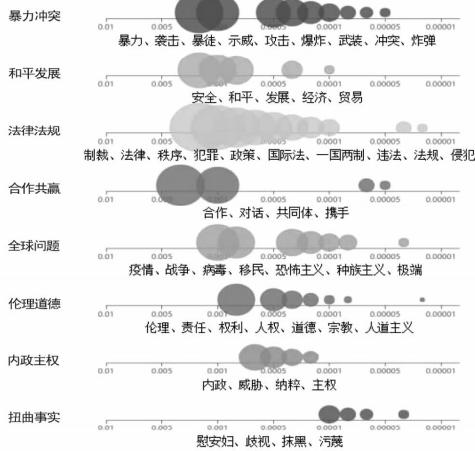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主题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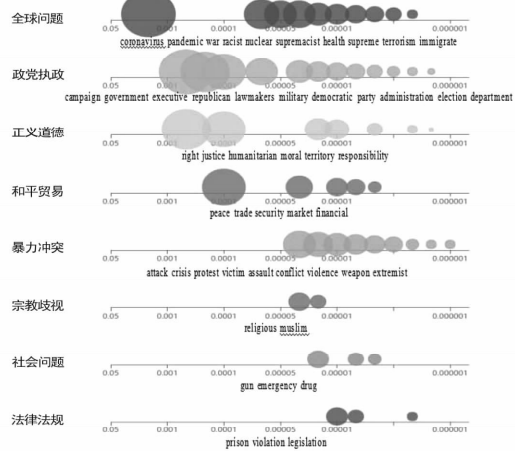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主题维度

宏观而言,中美政治谴责主题维度同中存异。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语言-伦理内涵与语言-伦理条件层面:内涵层面,政治主体在进行谴责时,需提供谴责理由(Bergmann 1998),因而往往诉诸道德、法律等对谴责正当性进行说明。条件层面,双方主题维度均为对负面政治事件的表态与评价,这些维度是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部分。作为世界大国,中美双方均在维护国际秩序、坚持道义等方面予以回应。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语言-伦理内涵层面:中美政治谴责反映了两国基于不同伦理所关注的不同事件与舆情。中国强调最多的是“暴力冲突”,而美国为“全球问题”,反映了中国对和平与合作的关切,美国对全球性事件的关注。同时,中国主题维度中“合作共赢”“主权内政”等,反映中国对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念的强调。而美国关注“政党执政”“社会问题”等,体现美国对总统大选、枪支暴力等的谴责,揭示美国谋求有效执政、社会安定等。

微观而言,中美政治谴责的主题分布差异显著,主要体现在语言-伦理内涵层面:一方面,中美政治谴责对同一主题的关注度有所不同,反映中美双方所面临的不同社会情况与伦理道德观。中国政治主体对萨德、恐怖袭击等事件的集中谴责,表明以和为贵的立场;美国的谴责主题反映了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等流行病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体现美国社群主义等政治伦理(李玉良 2022)。另一方面,在相似主题维度,双方对不同主题的关注度也有所差异。如在伦理维度,中国强调明示的“伦理”和“责任”,而美国关注“right”与“justice”,说明中国对伦理的维护,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而美国着力于对权利-义务关系及公平公正的强调。

4.2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语言策略对比

语用策略即对语言隐性和显性意义的交互作用进行协调(Verschueren 1998)。一般而言,依据是否包含言外之力指示手段,言语行为策略可分为直接、规约与间接。然而,政治谴责大多包含明示施为动词,施为语力更加复杂。本研究认为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包含多个语义成分与序列,属于宏观言语行为(Blum-Kulka & Olshtain 1984)。具有谴责功能的语力是中心言语行为;而其它语义成分意在辅助谴责言语行为的实现,用以强化或弱化谴责语力。本研究进一步将谴责言语行为策略分为内部与外部策略,内部策略即中心言语行为多体现在语言-伦理条件层面,包括视角、升级语与降级语,外部策略多体现在语言-伦理条件与语言-伦理评价层面,包括起始行为语、前辅助行为以及后辅助行为。

基于对抽取样本内、外部策略的标注和分类结果,本研究对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不同策略的频数分别进行统计,并对各策略的使用差异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见下表。

表3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内部策略对比研究

策略 维度	视角				升级语				降级语			
策略	自我 视角	模糊 视角	他者 视角	小计	谴责 重陈语	负评 强化语	谴责 凸显语	小计	谴责 弱陈语	施为 缓和语	主体 潜隐语	小计
中国	35	37	65	137	82	53	75	210	33	49	22	104
美国	32	50	56	138	59	49	71	179	54	51	15	120
<i>p</i> 值	0.304	0.002	0.261	0.002	0.877	0.168	0.067	0.042	0	0.049	0.897	0

4.2.1 视角

视角是发话者与话语的对应状态。其中,自我视角是谴责者以第一人称及其变体发出谴责言语行为;模糊视角指省略、隐晦发话者,突出谴责本身;他者视角指通过引述政治家或媒体等其他政治主体的观点发出谴责行为。

不同视角选择中,中美政治主体均首选他者视角,次之为模糊视角,自我视角最少。谴责言语行为直接对被谴责者的错误行为进行指责,本身具有冒犯与冲突特性(Leech 1983),对发话者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威胁。因而,中美政治主体均通过最隐含的视角进行谴责,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谴责言语行为的威胁程度。

(1) 国际舆论谴责美国政客冷战思维……巴基斯坦外事咨询委员会成员、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院长阿迪勒·纳吉姆说,在过去20年间,美国对自己的认知始终存在误解……俄罗斯战略规划与预测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说,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违反了国际法……(中国网 20200726)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模糊视角使用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2 < 0.05$),美国政治主体更倾向于通过模糊视角发出谴责。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受句法影响,英语重形合,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通过被动语态突出谴责内容或被谴责者;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公众、舆论等方式隐去谴责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某一错误行为已为受众广泛谴责,以此肯定既有伦理规范,增强谴责行为的合法性。

(2) Biden empathized with those who are protesting across the n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police killing of Floyd in Minnesota in way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not...— a move that had been widely condemned.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200607)

4.2.2 升级语

升级语是强化施为语力标记语,其中的谴责重陈语直接修饰施为动词以增强谴责语力;负评强化语指对被谴责者、错误行为的描述性或评价性斥责;谴责凸显语即通过并列、重复等方式突出谴责内容。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中升级语频数均远高于降级语,说明中美政治谴责均明示且强硬,这一现象与先行政治言语行为研究有所差异。作为具有不礼貌内质的言语行为(Edmondson & House 1981),谴责言语行为理论上应使用更为缓和的语言策略来降低语言的威胁性(刘风光等 2019)。而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谴责内容在伦理上的合法性。

(3) 印尼军舰滥用武力,袭扰枪击中国渔船……,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对此种滥用武力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外交部 20160620)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升级语在总体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42 < 0.05$),中国政治主体更倾向于使用升级策略强化谴责语力,这是受中国政治话语的程式性特征影响(Liu & Shi 2019)。此

外,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策略是谴责重陈语,而美国是谴责凸显语。这是因为对特定概念可通过短语或小句等分析型表达法或以词汇为媒介的综合型表达法进行阐释(Banczerowski 1980: 336),其中汉语多为“副词+动词”分析型表达法,而英语则通过同义词并列或重复等综合型表达法强化语力。

(4) 美众议院执意通过涉港法案,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关系原则,必须受到强烈谴责。(人民网 20191017)

(5) I condemn them. I disavow, and I condemn. (美国广播公司 20161122)

4.2.3 降级语

降级语是用以弱化施为语力的标记语,其中的谴责弱陈语即谴责类动词的规约性或情态化表达;施为缓和语指非以谴责及相关动词直接发出谴责的语言形式;主体潜隐语即强调谴责行为的集体性,使谴责主体隐晦,降低谴责行为的冲突性。

中美在谴责弱陈语与施为缓和语策略层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0 < 0.05$; $p = 0.045 < 0.05$),即美国政治主体更倾向于使用降级策略进行谴责。这一方面是因为英语中使用间接性语言的现象极为普遍(何兆熊 1984),尤其是具有不礼貌功能的话语通常以主动陈述句以外的句法形式来实现,以降低其断然性(Ervin-Tripp 1976);另一方面,谴责弱陈语与施为缓和语策略中隐含着潜在的权利-义务关系,谴责者需对被谴责者的错误行为作出伦理判断(Longacre 1983)。这与美国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主题相一致,在对执政问题的高频谴责中,政治主体多通过凸显执政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保证谴责行为的合理性。

(6) Clinton: Trump deserves some blame for violence outside events. Protesters and supporters of Trump clashed in the streets of San Jose, California, Thursday night after the billionaire held a rally.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60605)

此外,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内部策略中,主体潜隐语频次最低。虽主体潜隐语预设了错误行为对伦理的违反,弱化了谴责的主动性,相对来说威胁性最低(Edmondson & House 1981),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社会排斥;但主体潜隐语不容易被受众识别,在政治谴责中不够明示,因此中美政治主体只在威胁性较高的语境中使用这一策略。

(7)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stand together in condemning the systematic, ongoing, and egregious abuses of religious freedom perpetrated by terrorist and extremist groups. (美国外交部 20190718)

表4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外部策略对比研究

层面	起始行为语				前辅助行为				后辅助行为			
微观	称谓语	提醒语	强调语	小计	指出 违背 规则 或伦 理等 行为	表达 不认同、 指责等 态度	陈述 谴责 理由 (如消 极影 响等)	小计	提出 请求 或建议	表明 己方 立场	做出 承诺	小计
中国	96	73	34	203	100	98	95	293	66	98	38	202
美国	99	59	28	186	100	100	43	276	73	100	21	194
p 值	0.006	0.417	0.574	0.006	0.010	0.007	0.025	0.000	0.006	0.007	0.490	0.001

4.2.4 起始行为语

起始行为语是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中引起政治受众对谴责内容感知的部分,具有语用调节作用。其中的称谓语即指称性话语,指出被谴责者的同时,触发谴责言语行为;提醒语指有意提到的内容,是政治主体立场的重要标志;强调语即强化信息,具有警示功能,能够增强谴责语力。

统计结果显示,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起始行为语整体分布相似,称谓语使用频率最高,提醒语次之,强调语最少。称谓语通常处于谴责言语行为的开端,明示地指出被谴责者及其行为。提醒语与强调语都是政治主体有意凸显的部分,因而均有加重语气的作用。

(8)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We reiterate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60403)

此外,中美在称谓语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6 < 0.05$),美国政治主体更倾向于明确指出谴责对象,在低语境的英语语言(Hall 1976)中话语意义的识解依赖特定语言形式,需要明确呈现信息。而在汉语中,虽未明确指出谴责对象,但受众能够在语境中识别意义。

4.2.5 前辅助行为

前辅助行为即出现在中心言语行为之前的言语序列,用以辅助中心言语行为实现特定语力,同时强化或弱化语力。其中,指出错误行为使谴责内容明示,表达态度使谴责更明确,而陈述理由使谴责本身更具正当性,因而均有强化谴责语力的作用。

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前辅助行为频次均较高,即因谴责自身的冲突性(Taylor 1991),具有说明道德正当性的内在要求(McKenna 2013)。同时,中美前辅助行为的使用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0 < 0.05$),中国政治主体更倾向于在前辅助行为的基础上做出谴责。这一结果与汉语思维模式密不可分,受传统哲学的影响,汉语在陈述主题时多通过归纳推理模式,即话题推迟出现(topic-delayed)(Scollon & Scollon 1995),含蓄、隐晦地表达观点。此外,在“错误行为”“表达态度”“陈述理由”策略上,中美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10 < 0.05$; $p = 0.007 < 0.05$; $p = 0.025 < 0.05$),即美国政治谴责中谴责内容和政治主体的态度更为明示,而中国更倾向于说明谴责理由。

(9)印方所作所为违反 1890 年条约及其确定的中印既定边界,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更是对地区和平稳定和正常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不会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容忍。(中国外交部 20170802)

4.2.6 后辅助行为

后辅助行为是在中心言语行为之后的言语序列,作为宏观谴责言语行为的重要部分进一步实现政治谴责的目的。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后辅助行为包括提出请求或建议、表明立场以及做出承诺三大类。后辅助行为多受政治主体权利-义务的制约,维护或构建特定伦理范式(哈贝马斯 2018)。

统计结果显示,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后辅助行为的分布趋势大致相同,表明立场频次最高,提出建议次之,做出承诺最低。伦理语言本身具有规定性(朱贻庭 2010),在谴责之余,通过请求、建议、承诺等子言语行为宣传自身价值观,是政治主体掌握政治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在表明立场、提出建议层面,中美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6 < 0.05$; $p = 0.007 < 0.05$)。美国政治主体更倾向于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构建或重构政治伦理,注重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构建。

(10)We urge the Maduro regime t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persons detained in Venezuela and reiterate our call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all those who are arbitrarily detained, including political prisoners.(美国外交部 20180817)

4.3 伦理语用学视阈下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对比归因

政治语篇言语行为受历史、社会和文化体系的交际规范以及政治主体特定权利-义务惯例的制约(Kadar & Zhang 2019),伦理性更为彰明。其中,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具有以下特质:

激发道德认知,规范国际伦理。政治伦理规范是在持续对话的“论证”中构建的(哈贝马斯 2018)。在当前多元的政治世界,解决价值冲突、寻求伦理规范是政治谴责言语行为的内在诉求。政治主体通过批判脱离伦理价值的行为,如恐怖主义、贸易霸凌等,并对其违反法律、违背伦理以及消极影响等进行解释说明,赋予特定价值规范以正当性的基础。在不断论证与对话的过程中,激发公众及其它政治行为体的道德认知,呈扬异质政治受众共同接受的伦理规范体系。

构建伦理秩序,传播政治观念。政治语言作为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Gee 2000),政治主体发出谴责的目的不只谴责本身,更多的是在国际社会中迎合受众期望(Walker 2006),构建并普及自身价值观(Warner 2005)。政治主体通过强调不同谴责主题,或通过表达立场、提出建议等辅助行为巩固与传播自身的伦理观念。此外,被谴责对象的错误行为可能并不存在,而是在话语中构建的(Bergmann 1998)。因此,政治主体在发出谴责的同时,也在昭示其价值模式,构建并引导政治受众接受特定的伦理秩序,传播自身的政治观念。

触发伦理情感,引导舆情走向。伦理情感的触发是引发异质政治受众共鸣(哈贝马斯 2018)、引导舆情的重要方式。政治谴责中既有批评与表态言外之力,亦有明示或隐含的评价性施为语力,在传达政治主体态度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着伦理评判和价值导向,触发政治受众的伦理情感。为实现这一功能,政治主体在谴责言语行为主题维度,均强调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触发公众伦理情感。在言语行为语言形式维度,中美政治主体均通过内、外部言语行为策略强化或缓和谴责语力,以期与受众形成关系联结(Kadar & Zhang 2019),引导舆论走向。

5. 结论

本研究在述介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内蕴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异同及其潜在的伦理价值。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旨在从以下方面为我国政治话语的理解和传播提供启示:其一,政治话语的内容应考量伦理规范,古训“德不孤,必有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注重对中国秩序观、义利观、道义观的阐释,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促进异质受众对中国文化与伦理的认可,构建中国政治话语伦理秩序;其二,政治话语的产出应充分考虑政治语境的多元性与政治受众的异质性,符合受众期待,努力使汉语与其它语种思维方式接轨,以提高中国政治话语的接受度;其三,政治话语的传播应强调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与伦理的国际传播,以此强化对话语权的掌握与控制,增强中国伦理理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 Ayres, L., Kavanaugh, K. & K. Knafel. Within-case and across-case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03, 13(6): 871-883.
- [3] Banczerowski, J. Some contrastive considerations about semantic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C]// Fisiak, J. *Theoretical Issues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0.
- [4] Bergmann, J. R. Introduction: Morality in discourse[J].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1998, 31: 279-294.
- [5] Blum-Kulka, S. & E. Olshtain. Requests and apologi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peech act realisation pattern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4, (3): 196-213.

- [6] Braithwaite, J.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7] Buttny, R.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Communica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3.
- [8] Dixon, J. & K. Durrheim. Contact and the ecology of racial division: Some varieties of informal segrega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42; 1 – 23.
- [9] Dovey, J. *Freakshow: First Person Media and Factual Television*[M].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 [10] Edmondson, W. & J. House. *Let's Talk and Talk About It*[M]. München: Urban and Schwarzenberg, 1981.
- [11] Ervin-Tripp, S. Is Sybil there? The structure of some American English directives[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6, 5(1): 25 – 66.
- [12] Finlay, W. M. L. Denunc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orms in group conflict: Examples from an Al-Qaeda-supporting group[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4, 53(4): 691 – 710.
- [13] Fitzpatrick, S. & R. Gellately.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s of denunci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6, 68; 747 – 767.
- [14] Gee, J.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5] Hall, E.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 [16] Hansson, S.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blame avoidance in govern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Discourse & Society*. 2015, 26 (3): 297 – 322.
- [17] Kádár, D. & S. Zhang. (Im)politeness and alignment: A case study of public monologues[J].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ca*, 2019, 66(2): 229 – 249.
- [18] Kampf, Z. Political speech acts in contrast: The case of calls to condemn in news interview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21, 180: 203 – 218.
- [19] Kampf, Z. & N. Löwenheim. Rituals of ap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J]. *Security Dialogue*, 2012(1): 43 – 60.
- [20] Krauss, S. 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aning making: A primer[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005, 10(4): 758 – 770.
- [21] Leech, G. N.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New York: Longman, 1983.
- [22] Liu, F. & W. Shi. Political advice in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s)[J].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ca*, 2019, 66 (2): 209 – 228.
- [23] Longacre, R. E. *The Grammar of Discourse: Notional and Surface Structures*[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3.
- [24] Malle, B. F., Guglielmo, S. & A. E. Monroe. A theory of blame[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4, 25(2): 147 – 186.
- [25] Márquez-Reiter, A. & M. Haugh. Denunciation, blame and the moral turn in public life[J].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019, 28; 35 – 43.
- [26] McKenna, M. Directed blame and conversation[C]// Coates, D. J. & N. A. Tognazzini. *Blame: Its Nature and No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7] Noy, C. 'I was here!': Addressivity structures and inscribing practices as indexical resources[J]. *Discourse Studies*, 2009, 11(4), 421 – 440.
- [28] Scollon, R. & S. W. Scoll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M].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5.
- [29] Taylor, S. E. Asymmetrical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The mobilization-minimization hypothesi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1, 110; 67 – 85.
- [30]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Arnold, 1998.

- [31] Walker, M. U. *Moral Repair: Recons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2] Warner, M.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M]. New York: Zone Books, 2005.
- [33] Wodak, R. Blaming and denying: Pragmatics [C]// Brown, K.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4] 查尔斯·斯蒂文森. 伦理学与语言[M]. 姚新中、秦志华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35] 陈新仁. 跨学科前沿研究: 伦理语用学[J]. 中国外语, 2017, 14(3): 9-10.
- [36] 韩丹. 构式视阈下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5): 37-46.
- [37] 何兆熊. 英语语言的间接性[J]. 外国语, 1984, (3): 9-13.
- [38] 李玉良. 《论语》翻译与美国当代政治哲学[J]. 外国语, 2022, 45(1): 103-110.
- [39] 刘风光, 石文瑞, 邓耀臣. 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对比研究——以外交话语为例[J]. 外语教学, 2019, 40(2): 44-50.
- [40] 彭文钊. 哲学阐释学视域下的政治语言学: 哲学基础、语言观与政治观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 (2): 26-37.
- [41] 阎学通. 大国领导力[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 [42]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43]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44] 朱贻庭. 伦理学大辞典[M].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术语的整理、英译及双语术语知识库建设”(18BYY126); 本成果受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科带头人资助经费支持。

收稿日期: 2021-09-01

作者简介: 刘风光,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语用学、语篇分析、政治语言学。
石文瑞,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语用学、语篇分析、政治语言学。

《等音节格律诗新译莎士比亚(选集)》

世界各国的莎学研究一直十分活跃, 我国的莎著翻译也高居翻译文学之冠。莎士比亚是诗人, 他的传世之作除了诗篇之外, 多为数量庞大的诗剧。本书作者俞步凡运用汉语诗歌中传统的三、五、七及戏曲三三四等格律形式翻译莎著格律诗, 弥补了历来散文或散文诗译法未能反映莎著格律诗原貌的缺憾, 作者首创按莎氏原著诗剧十音节无韵格律诗做等音节字数汉译的方式, 以求忠实译莎氏的诗作。对于莎著中丰富复杂的高技巧言语表达, 比如双关语等, 作者均以地道灵活的汉语译出, 又不失原著的风貌和特色。